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与华文传媒研究丛书

王列耀 主编

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
报纸副刊与「新生代文学」

王列耀 温明明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与华文传媒研究丛书

王列耀 主编

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
报纸副刊与「新生代文学」

王列耀 温明耿
等著

藏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90 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副刊与“新生代文学”/王列耀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与华文传媒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046 - 5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中文 - 报纸 - 研究 - 马来西亚②华文文学 - 文学研究 - 马来西亚 IV. ①G219.338②I338.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48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曲弘梅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26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文学与华文传媒的互动研究”
(09YJA751037) 结项成果

本书出版由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资助



目 录

绪论 马华文学研究对象、现状与方法	(1)
第一节 作为文化镜像的海外中文——马华文学及其学术价值	(1)
第二节 相关概念、术语阐释	(9)
一 字辈断代法	(9)
二 马华“新生代作家”	(11)
三 留台与旅台作家	(11)
第三节 相关研究回顾	(13)
一 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研究	(13)
二 马华新生代文学研究	(16)
三 新生代文学与报纸副刊关系研究	(23)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26)
第一章 边缘的声音：华文报纸的承担	(33)
第一节 参与的政治：华文报纸与华人话语权	(33)
一 宰制与回应：华人政治与文化生态	(34)
二 “为承认而斗争”：华人社会与华文报纸	(44)
三 时间帷幕：《星洲日报》、《南洋商报》	(49)
第二节 90年代：报纸副刊的文学承担	(55)
一 花团锦簇：报纸文艺副刊巡礼	(55)
二 文艺副刊：夹缝中的文化空间	(60)
三 编辑理念与副刊走向——以张永修为对象	(62)
第二章 马华报纸副刊与作家代际演变	(73)
第一节 副刊变革与新生代崛起	(73)

一 副刊改版与秩序重构	(73)
二 文学专辑、专栏与“新生代”	(77)
第二节 马华报纸副刊与文坛论争	(81)
一 从“‘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到“开庭审讯”	(81)
二 从“经典缺席”到“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	(87)
三 从“当代诗选”到“当代文学大系”	(94)
四 从“中国性”到“奶水论”	(98)
第三节 文坛论争与文学“新生代”	(103)
一 副刊“课题”与文坛论争	(104)
二 “广场”、“话题”与文坛论争	(106)
三 “课题”、“话题”与新文学史策略	(108)
第三章 副刊语境与新生代诗歌书写	(112)
第一节 文艺副刊与新生代诗人	(112)
一 副刊与新生代诗人的文学史登场	(113)
二 扶持与展示：诗歌新美学的生成	(118)
三 诗歌新观念与文学空间之互塑	(123)
第二节 副刊语境与新生代诗歌的文化政治	(127)
一 栖身于副刊的诗性言说	(127)
二 新生代诗歌的政治性	(130)
三 新生代诗歌的文化政治表述策略	(134)
第三节 放逐书写及其诗学韵味	(138)
一 放逐与离散	(138)
二 传统意识的放逐书写	(140)
三 新生代诗人的自我放逐与主体建构	(143)
第四章 文艺副刊与新生代小说	(150)
第一节 栖身于副刊的新生代小说	(150)
一 媒介文化与新生代读者群	(150)
二 报纸副刊对新生代小说的推动	(154)
三 反思：文学性的流失	(159)
第二节 文艺副刊与新生代小说的历史书写	(161)

一 历史何以言说：文艺副刊的视角	(162)
二 下南洋：历史的尽头	(163)
三 “乡关何处”：故乡与原乡	(167)
四 族裔伤痛：马共与种族政治	(171)
第三节 副刊语境中的新生代主体性建构：以黎紫书、 黄锦树为对象	(177)
一 参与的主体性：副刊的意义	(178)
二 “告别的年代”：“母土”中的黎紫书	(181)
三 “由岛至岛”：弑“父”的黄锦树	(185)
第五章 报纸副刊与新生代散文	(192)
第一节 副刊“换帅”与新生代散文	(192)
一 本土化：副刊与新生的共鸣	(192)
二 “换帅”与新生的登场	(197)
第二节 报纸副刊与新生代文化散文	(204)
一 副刊“规划”与新生代文化散文	(205)
二 副刊与“文学民意”的生产与传播	(209)
第三节 文化散文的政治学与美学诉求	(215)
一 “原乡”神话：疏离与撕裂	(215)
二 “新神州”：“隶属”与“归属”	(218)
三 文类“互渗”：“论说化”、“诗化”、“小说化”	(222)
第四节 “副刊化”生存：散文发展的“双刃剑”	(229)
一 “生活流”、“谈话风”与“文化”	(230)
二 “公共性”取向与议论性散文	(235)
三 “媒体革命”：机遇还是威胁？	(239)
第六章 报纸副刊与新生代理论话语	(245)
第一节 新代的文学批评生态	(246)
一 在地批评与本土观照	(246)
二 旅台学者与边缘论述	(257)
三 直面相同的对象：在地批评者与旅台学者比较	(265)
第二节 评论专栏、专辑与新生代	(267)

一 副刊的评论专栏与专辑	(268)
二 张永修的“有所建树”	(270)
第三节 报纸副刊与新生代文学批评	(275)
一 合理的在场：新生代批评的副刊空间	(275)
二 话语的狂欢：副刊语境中的文学论争	(278)
三 辩证的反思：朝向一个学理性批评空间	(285)
第七章 “花踪”与新生代群体的崛起	(288)
第一节 《星洲日报》与花踪文学奖	(288)
一 “花踪”的诞生背景	(288)
二 “花踪”的奖项设置	(290)
三 花踪文学奖的“奥斯卡”效应	(294)
第二节 “花踪”与新生代的成长	(297)
一 “花踪”与文学场“占位”	(297)
二 步入“花踪”舞台的新生代	(299)
三 “花踪”与新生代“文学典律”的生成	(304)
第三节 “花踪”与新生代文学追求	(309)
一 “花踪”与新生代创作的“本土性”	(309)
二 “花踪”与新生代创作的美学追求	(315)
三 “花踪”盛宴之后的反思	(321)
第八章 反思：90 年代马华报纸与新生代文学	(328)
第一节 依附或互动？	(328)
第二节 共同的抵抗：生动与深刻的时代文学	(333)
第三节 抵抗与妥协：艰辛与悲情的“文化表演”	(338)
第四节 互动之后：反思	(340)
后记	(342)

绪 论

马华文学研究对象、现状与方法

第一节 作为文化镜像的海外中文—— 马华文学及其学术价值

在中国当代文化与学术语境中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除作为一门学问的自身价值之外，还有海外华文的文化镜像意义。最为直接的激发因素应当是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作为表述、理解以及进入中国的语言途径，汉语（华文/中文）语言之世界地位因此得到极大提升。搭建更为宏大的理论框架，有助于华文文学获得与国际其他语种文学对话的条件。事实上，探讨传统东方文化与现代性遭遇而走过的曲折历程，其中生存与发展终极命题在远方展现出迷人的承诺；选择出走的移民群体及其文化心理遭遇，因此而成为开掘世界人文社科新论域中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课题，其中，“下南洋”是别开生面、意味深长的经典个案。

从中国本位出发，走出国家阈限获得“世界文学”的客观承认，既与语言使用群体规模这一基本现实相匹配，又深刻反映中国历经现代化浪潮对于世界文学格局重新编码的认同焦虑。不论其中是否包含“文化中国”的历史沉淀或某种大国风度的想象，母语文学作为印刻生存主体的感知与沉思方式，显然在现实层面打开了语言与生命的鲜活通道，华文文学提供了在中华文明及其民族志演化的曲折过程中形塑的群体经验，它们因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呈现“世界—地方”、“亚洲—中国”、“中原—南洋”等互动共生的标本意义。

在此逻辑结构中，马华文学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展开过程，被隔离于中国本土空间之外，糅合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语境，

相关文学构思与实践呈现出复杂与差异。在华族融入本土文化的艰难过程中，华人借助中文语言这样一个尚能完整传达华族思想心灵的工具，除了实现语言习得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在马来西亚独特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转换中展现新的意蕴，展示出语言在实践活动中包含的多种可能。当然，这些丰富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艺术的形式实现的。

国家命运深刻影响国民而且决定国族文化的内容与结构，汉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赋予文化政治性。20 世纪初由知识精英发起的以改造国民建构现代国家为根本宗旨的语言改革，着眼于形声文字在文化普及方面的有效性考虑，受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成功经验刺激，语言“欧化”一时成为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当时争论的重心甚至不在于汉语是否应该欧化，而是技术层面如何实现欧化的可行性操作，换句话说，有关汉语不再适合时代这一点上几乎不约而同。^① 虽然诸种方案最终未产生实质性后果，但是对于汉字本身的意义承载能力及其文化自信多少产生了消解作用，至少动摇了语言作为逻辑思维工具所拥有的不可置疑（unquestionable）特征。由此产生的潜在命题是，语言可以通过丰富的实践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新的语词和表述在交往中被源源不断创造出来，并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合法性便得到不言自明的确证。如果说中国本土新文学发展仅仅证明文化土壤的繁殖能力，那么，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之跨界旅行无疑具有更加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有力地再现已语言本身蕴藏的言说生机，而且还从文化层面彰显语言生命得以

① 日本的文言一致被认为是“为建立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事项”（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35 页），这一革新从“废汉”入手，幕府末期前岛密提出《汉字御废止之义》，并不是为了突出民族意识而消除汉文化“影响的焦虑”，而是因为普及国民教育“尽其可能用简易之文字文章”。“日语假名学会”（1883 年 7 月）与“罗马字学会”（1885 年 1 月）的结成正是在所谓鹿鸣馆时代，柄谷行人认为，发生于这段时间的文言一致运动主要是从文字本身来考虑的，出于对文字新概念的认识：“引起幕府反译方前岛密注目的是声音性的文字所具有的经济性、直接性和民主性。他感到西欧的优越在于声音性的文字，因此，认为实现日语的声音文字化乃是紧迫的课题。”（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 36 页。）由日本效应而对中国留学生或知识精英产生改造汉字/汉语以适应于文化普及的心理暗示，应当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

维系的重要条件：不同语言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语言的活力在于主体不断的实践。换言之，语言在日常交往中的操作决定了语言本身的作用。由于面对区域文化语境不同，海外华人群体对于语言特别是母语的应用呈现出巨大差异，此种差异与其说是他族语言带来的选择可能，不如说支撑语言的文化诉求造成自由选择压迫。他者文化空间的进入意味着“此在”维度的逃离，其执行程度显然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文化处境。移居西方文化中的海外华人，由代际转换表现出逐渐西化的特征，而在亚洲的华人则努力保持其母语文化身份，恰恰说明文化政治对于主体塑造的深刻影响。

马华文学在海外行旅及运作，得益于华人对族群身份和中华文化的强烈维系决心，儒家重文轻商的文化传统，深化了“向内转”的自我完善理念，华文教育这个根本决定华文文学的条件得以贯穿华人子弟不同阶段，与此同时，华文报纸反映族群利益和心声，着力于通过文学提高文化接受和表达能力，可以说，华教（华文教育的简称）和华刊（华文报纸杂志的简称）成为保证华语文学高效发展的两翼。马华文学面临少数族裔文学发展的普遍困境，如身份认同、族群地位、重建国家文学等诸种问题，皆可归之为生存实际问题，它们塑造了马华文学的基本主题和抵抗色彩，也为其文学现代性诉求提供源源不断的外在动力。马华文学对现实问题的介入，未抽离文学自身无法回避的载道功能。载道与言志这对看起来对立的概念有时暧昧难分，正如周作人当年所戏言，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①当然，如果我们仅从纯粹文学层面考察，具体到形而下的功利考虑可以忽略不计。需要注意马华文学拥有文化自洽性，也就是说，马华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镜像意义不是其存在的依据，不论它与中国文学及其传统构成了如何密切的互文性关系，甚至在不同历史年代保持着不同的交互姿态，它并不以中国文学的海外镜像作用而获得存在理由。马华文学由生息、行旅于马来半岛的生存主体创造，其价值确证通过书写对象和文学自身完成。这一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一集》“序”，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1页。

点是主体考察需要注意的方法原则，亦是从“海外华文文学”理论角度谈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话语前提。

从学理及其知识谱系追溯，如果说马华文学已经成为特定政治文化语境（如马来亚、南洋）培植起来的生命体系，它无疑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资源——当然远不限于此，至少应当追溯到 19 世纪下半叶华人在海峡殖民地的规模化谋生浪潮，以及由热带雨林气候塑造的生存和沉思方式。不论如何，马华文学本土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参照作用，主要在 50 年代脱殖独立以后的历史维度中得到彰显。作为 20 世纪中国遭遇现代性曲折展开的重要阶段，中国当代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对话确实是隐性的，但是潜在对话造成的后果一直渗透在马华文学论域，客观地说，二者对于彼此产生的文化张力并不对等。若取中国文化本位的“外位性”（outsideness）立场观之，马华文学这样一个境外运行标本所提供的参照意义，就是它验证了文学赖以健康、持续生长的基本要素，以及其文学作为话语体系所指向的那些宏大命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文学的政治文化色彩，主体的生存状况和所处时代的命运主题决定着文学的底色和格局，因此马华文学作为折射中国文学困境的一种角度，既有“少数文学”对独特文化议题的深刻揭示，也从以色列理论家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文学复系统理论（literary polysystem theory）空间中开掘出令人深思的思想空间。^①

但是，这些并不能否认马华文学始终将中国文学作为表述文化身份

① 率先引入复系统理论分析马华文学的旅台学者是张锦忠，1995 年他发表《文学史方法论：一个复系统的考虑；兼论陈瑞献与马华现代文学系统的兴起》，此后有《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1998）、《台湾文学复系统中的马华文学》（2001）等文章谈论复系统结构。正如黄锦树曾经质疑的一样，张氏以陈瑞献为个案来讨论马华文学复系统的建构，超越了国籍对作家的限制，亦可能导致复系统的理论自限变得漫无边际，退回到原来的混乱状态（黄锦树：《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视域（代序）》，载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麦田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 页），“复系统”本身也成为“无用”的概念。本书此处涉及的复系统理论，则指在“中国文学”范畴里面潜藏的其他文学可能，如中原文学、边疆文学、汉语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港台文学，等等。马华文学作为一个海外参照，刺激了我们对文学系统生成、结构及其变异的思考。

或认同意味的参照对象,从华文文学发生到中国文学的海外拓展,特别是早期直接沐浴于中国文学馨香与朝露而成长起来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作家,他们在情感认同层面无法否认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显在关系,马华文学以“侨民文学”质地存在于他们内心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让广大华人意识到华社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壮大集体的力量,在华人被视为外来异族的马来社会中谋取生存话语权力,以加速华人融入马来西亚国家的进程。70年代以降,有关马华文化与马华文学的讨论逐渐摆上台面,马华文学之所以自成体系,逻辑立足点在于马华文学自身合法性的获得。不过,由于马华文学面临的特殊处境,在文学场域上始终存在某种缺憾,何国忠在梳理马华文学政治性时引述留台作家赖瑞和在70年代谈到的一种真实体会,赖氏说:“我以为,一个作者,如果真的要严肃的去搞中国文学,或者要在某种中国的传统下写作,他迟早会发现,马来西亚实在不是一个适合的地方。我所持的理由是:‘这里的社会不是一个纯粹中国人的社会。’”^①当我们讨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总体条件时,往往只看到拓荒式的工作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对实践主体面临的困境则了解不够,或即便有所了解亦将其当成可接受的现实而给予特殊的谅解,赖瑞和的自况与20世纪80年代海外华文文学批评兴起之初的“怜爱”姿态颇为相似,一定程度反映出文化中心主义对认知过程的自我遮蔽,其实在不同群体那里具有同样的发生机制。正如何国忠所说,温瑞安强烈认同中国文学之于马华文学的母体作用,温氏视中国文学为马华文学的前提,因此讨论马华文学的合法性建构首先必须承认华文与汉语之间的同一性,如果只强调马来西亚化,对于文字自身的传统与文化积累必然产生割裂,此种趋向对于马华作家不会产生正面的影响。“温瑞安的儒家心态使他不能停留在‘文学就是文学’的美学思考,文学最终溢出美学的范围,大一统的心态使到许多作者强调文学的发展必然是百川汇海。”^②留学中

① 赖瑞和:《文化回归和自我放逐》,《马华文学》,文艺书屋1974年版,第154页。

② 何国忠:《马华文学: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变奏》,载许文荣主编《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方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

国台湾的经历对于马华作家产生深远影响，直到 90 年代末，台湾向马华青年学生提供的思想资源仍是大陆不能相提并论的，事实上马华新生代的旅台经验收获的不是有关马华文学与大陆、台湾文学脉络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而是建立了一种马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居何处的宏大视域，对于包括马华文学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

90 年代中国文学面临的重大挑战来自经济体制调整之下的生存方式的变化，以及由商业化运作而产生的文学话语空间重构。不论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强势崛起，还是诗歌的“圣化”与“俗化”分裂，都突出了价值多元趋势对于文学理想的某种观念化想象，生存空间在世俗现代性潮流下被悄然拓展，意味着生存主体的实践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改变。90 年代大马华人的命运亦在现代性浪潮中拓宽了腾挪空间，尽管种族政治必然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延续其统治威力，但是经受长达 20 年的“新经济政策”洗礼，华人与巫族的经济地位已今非昔比，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暂时缓解，并在华人新生代的代际更替中呈现为生存感受、文化与消费立场、审美经验的整体更新。90 年代初开始的代际转换带来的集体心境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这时来自中原的遥远记忆早已消失，但是在学习、就业方面仍未松动的诸多限制让华裔新生代更为强烈地感到被“自己的国家”排斥，如此困境开始困扰他们对于马来西亚的国家感情，清除自身的中国文化印记与“澄清”马来西亚国民身份之间便建立起隐秘的关联，可以说支撑了 90 年代马华新生代作家的话语姿态。^① 客观地说，马华的遭遇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相比，仍然是较早地开启了文化理解和谅解进程。

当然，这种理解过程因为历史和文化复杂性而充满坎坷。进入 90

① 如黄锦树对林幸谦“过度泛滥的乡愁”的批评，即是因为林幸谦在诗中表达了对“中原”的强烈思念，黄锦树认为“中国像是一个严重的创伤，让他一直沉浸在创伤的痛楚及由之而来的陶醉中。他像一个失恋者，一直面对旧情人恋恋不忘；以致无法面对其他的可能对象。”（黄锦树：《两窗之间》，《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95 年 6 月 9 日，11 版。）此种“身份的焦虑”，可参见王列耀、龙扬志《身份的焦虑：论 90 年代马华文学论争》一文分析，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年代以后,“马华文学”从概念开始受到新生代作家质疑,作为被类似“海外华文文学”名义统摄的国别华文文学,值得讨论的当然不是名称本身的可商榷性,而是必须深入马来西亚历史语境中的种族政治,探讨马华族群在现代马来西亚国家诸种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合理诉求。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认知对象,针对“马华”的反思确实意味深长,以华人为文学主体的定位,可以再现华族完成生存转换及国家认同的复杂过程,由此为文学地位的国家合法性谋求奠定基础,虽然并非当时展开文学概念反思的全部目的,但确实推动了相关课题的思考,至少已经在马华文学纳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内在组成部分提出时成为一个亟须认真审视的问题。90年代由文学主题而逐渐展开的全部话题讨论,使得文学承担起某种社会文化反思的先锋角色,这一点与80年代中国话语空间建构极为相似。从发生学源头看,马华文学的历史面貌由马华族群的生存实践决定,因此马华文学这一个与中国文学平行互生的海外镜像,一定程度上既是华、巫两族之间关系张力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份充满着艰辛、悲情和荣辱的殖民遗产,同时提供了该语言作为使用规模巨大的文学工具在世界文学格局里变异及再生的可能。

孙振玉简要分析过马来西亚华巫种族政治的形成过程:

英国统治者为了追求自身的殖民经济利益而推行的移民政策极大地改变了该殖民地的族群结构现状,而其“分而治之”的族群统治手法,又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包括华巫两族在内的族群间的疏远相对立。所谓“分而治之”,就是针对不同的族群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统治手法,具体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利用马来族上层原有的政治资源实现其间接统治的目的,这的确为殖民地创造过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在保证实现其自身殖民利益的同时,也推动过殖民地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对于马来人上层而言,维系了他们传统的政治地位,并延续了有较长发展历史的马来人的政治文化。然而,在经济方面,英国的殖民统治,却通过引入包括华人在内的大量移民,让他们参与现代商品经济建设,榨取其

创造的剩余价值，与此同时，却把广大马来人（主要是下层）排除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之外，让他们继续从事落后的农业种植、山林采集或渔业捕捞，继续维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了殖民地原有居民与移民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分而治之，从一开始就奠定了马来人政治发展与华人经济发展的分野，而为日后两族间的矛盾和对立埋下了种子，为日后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出现种下了根由。^①

涉及当下意旨，在种族政治和文化背景展开的当代马华文学亦被赋予思想复杂性。围绕语言与种族属性指涉开展的反思，揭示出文学在华人群体命运书写与承担层面的现实针对性。如果从语言操作出发谈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可以发现更多有深层意蕴的现象。以马华作家与中华文化关系为例，新生代作家同样以华族文化继承者自居，但是他们更强调中华文化的“在地”转换，这种姿态显然具有意味深长的文化政治性，其潜在背景无疑是 90 年代以来思考族群命运时有关“身份重塑”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受中国当代文坛影响，不过青年作家更喜欢将其视为一种与文学本体相关而超越了文化共同体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与其他语种的文学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只是因为语言便利而有更多接触。

因此，当我们从文化层面谈论中国文学的海外镜像时，或许正是从另一个角度确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虽然海外华文文学从来就不是因为此种功能而存在，但是它呈现出文化互动背景下作为思想激发点的问题基质，也就是说，马华文学自身拥有和必须克服的困境，今天已经成了拓展人类认知领域的某种精神现象“病理”，这样一个属于后殖民理论范畴的凝视（gaze）对象，将在其自身命运主宰的不断实践与反思中，获得更为充足的学术与现实价值。同时，90 年

^① 孙振玉：《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及其关系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 页。

代加速的亚洲一体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理解,各国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台、港、澳文学交流日益密切,在迫切的“去畛域”和“去冷战”趋势下,文学主题、表现形式、艺术策略与所在国华族文化、文学结合,推动大区域华文文学史观念的诞生。以形声文字为基本工具形塑的亚洲华文文学整体性,提供了世界文学谱系重构的契机,“在亚洲发现文学”不仅彰显华文文学的沧桑历史,各个国家内部的语言变革也反映出亚洲文化现代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由于中国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存在语言工具这一“共享文学时空”的基本条件,集中产生了诸多具有超越地区和国家色彩的问题域。在文化呈现出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浪潮中,马华文学成为一个标准个案,至少在以华文为出发点的观察视野中,因为马华作家的跨区域流动带来了流散诗学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景观,而围绕马华文学形成的学术空间及其对话,亦因视野差异和理解过程的艰难,具有深入考察和研究意义。

第二节 相关概念、术语阐释

“马华新生代文学”,是本书的重要研究对象。围绕这一对象,有必要对几个有关的概念、术语做一些梳理与阐释。

一 字辈断代法

所谓“字辈断代法”,是指马华文坛独有的一种按照作家出生年代进行代际划分的方法,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成为马华文坛重要的代际命名方式。马华旅台作家陈大为对这一命名方式的形成过程及意义有简洁明了的交代:

以“字辈”为世代的划分,始于1983年的一部文选《黄色潜水艇》的主题:“6字辈人物”;其后就被继续沿用下来,凡是1960—1969年出生的文学创作者,都约定俗成地归入6字辈,渐渐成为一种“共识”。1992年3月始,《椰子屋》文学月刊连续